

## 知县保存了“一邑之文献”总是好事

贾自为

旧《房山县志》创纂于明万历庚辰年,当时房山县知县是马永亨,字龙川,陕西韩城县举人。任职期间,“刚正廉明,修废举坠,清丈地亩,积谷救荒,创修县志,多嘉政焉”(《房山县志》。《房山县志》续修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当时知县是佟有年,字孚六。又修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当时知县罗在公,字营六,四川营山县举人。再修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当时县尹张世法,字鹤泉,湘潭进士,亲自参加编纂。同治十一年增修县志。以后,清代再未修过县志。民国四年(1915年)、民国十一年(1922)两次编修县志,都没有成功。到民国十七年(1928),县知事冯庆澜请高书官主持编修了房山县最后一部旧县志。

从明万历庚辰年创编《房山县志》,到民国十七年(1928)编修最后一部房山旧县志的350多年中,共编修过六次,其外有两次编修未成。明代创编,清代编修过四次,国民时期编修过一次。创修与第二次编修相隔八十多年;第二次编修与第三次编修相隔27年,第三次编修与第四次编修相隔85年,第四次与第五次编修相隔96年;第五次编修与第六次编修相隔55年。从第六次编修(1928)到现在(1987)已整整60年了。如果按清代六十年修一次《志》的条律,现在也应该编写《房山县志》了。何况这六十年间,房山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成了房山的主人,人们当然希望尽早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新的《房山县志》。

清康熙三年,房山县知县佟有年为县志写序。他说:“予自受命以来,念此夙夜不敢或荒于功令所最亟者。次第行之,数月之内,颇获肯綮,既而考旧章于邑乘,仅从废籥中得睹残帙,字画模糊,不可句读,且阙略未修者近八十余载。失此不讲,房将无志。无志而一邑之因革盛衰与夫陵谷沧桑之故,后人其何知焉?是不大负朝廷设官分土之初意乎……”(《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本,佟志原序二)。佟有年看到的是残缺得不能辨认的县志,好不沮丧。他感慨于县志八十多年没有编修了,房山没有县志,后人怎么会知道房山的因革盛衰、陵谷沧桑呢!于是,他主持第二次编修《房山县志》。

《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本)是这样记述佟有年的:“佟有年,清辽东宁远县拔贡生,操履端洁,学问渊通;修学宫,葺公廡,严保甲,缮城池;不畏强权,革除火耗,缉捕盗贼,清理地方,捐廉以修县志,一邑之文献赖以仅存者,皆公力也。”

佟有年别的“功绩”我们姑且不谈,“捐廉以修县志”保存了“一邑之文献”,总是应该效法的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作者系原区史志办干部

## 房山义和团拾零

赵润东

清光绪年间，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外国披着慈善外衣的传教士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各地建立教堂，损害中国主权，以不平等的条约为护身符，与本国政府遥相呼应进行经济、文化侵略。这些外来的人面兽心的传教士，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欺辱百姓。当时的地方官吏感慑于这些外来侵略者，不敢维护本国利益。相反，还袒护教会和教徒。面对日益衰亡的国家和凶残的侵略者，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兴起，对国内封建统治者和国外侵略者是一次重大打击。

1900年旧历三月二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开始对义和团运动进行镇压。直隶总督裕禄发出了从严惩办义和团的告示。四月六日，英、美、德、法四国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限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剿。这一无理要求，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十二日，山东部分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境内，清政府又命裕禄查禁。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在直隶涿水县石亭镇用长矛将清军分统杨福同扎伤堕马，旋即毙命。二十七日，义和团毁了长辛店铁路。次日又毁了丰台铁路以及车站桥梁、电杆等，以阻止清军进攻。二十八日各国驻北京公使举行会议，决定调兵入市保护使馆。

义和团运动烽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外国侵略者。五月三十日，为了解脱危难和继续维护其侵华权益，英、俄、美、法四国驻华公使到总理衙门进行恫吓：“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名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第二天，英、美、俄、日、意水兵三百三十七人便进入北京外国使馆区。

就在各地义和团兴起的同一天，京郊房山一带的义和团队伍，也积极行动起来。这支义和团组织的首领——即团头叫庞大。大师兄叫田老大，二师兄叫张鑽。他们都是岳各庄乡天开人。众团民的组织纪律较为严明，他们在团头率领下，跪铁铤，走红砖，练得一身功，养成一身胆。当时，天开村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娘娘庙。庙内十分宽阔，殿宇非常宏观。义和团团民就聚集在这里并以此作为据点。与天开接壤的孤山口村，原来建有一座教室。教室内住着一个传教士，人们都叫他许二毛子。这许二毛子平时装出慈善的神态，显得老老实实。然而，洋鬼子及官府一来，他便原形毕露，张牙舞爪，以势欺人。当地百姓慑于他的权势，只得忍气吞声，见了面又叫他许二爷。这许二毛子曾勾结洋鬼子和官府镇压过义和团，而义和团也轰过许二毛子。

义和团清扫长毛时，曾与洋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七月二十九日，他们攻打北京，到西郊的西什库教堂捉拿二毛子，扒了韩征铁路。当时，团民们义愤填膺，越杀越勇，扒了铁轨便拆道木。一人扛一根道木竟不觉得累。这时，驻守在房山的清朝县官沙锅赵（因小时挑过挑儿卖过沙锅，所以当地百姓都叫他沙锅赵）奉朝廷之命，带领众官兵，围追阻截，捉捕义和团团民。团民们一方面与众官兵周旋，一方面与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因为受历史的局限，又加上缺乏组织领导和斗争经验不久义和团组织便受到官兵的冲袭破坏。团头庞大不幸被捕。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对外来侵略者恐惧、献媚，而对国内的爱国百姓则实行血腥镇压。坚强不屈的团头庞大被五花大绑押解到房山县城，斩首示众。接着，官兵又进行大搜捕凡与义和团有牵连者，均被逮捕屠杀。这次“搜捕”，许多人被官兵杀害并将头颅悬挂在南门外示众。此次运动，义和团伤亡惨重，损失很大。幸存者为了躲避官兵追捕，不得不解散组织，逃到上方山云水洞躲避。

官府与洋鬼子内外勾结，竭力镇压屠杀义和团。从此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所扼杀，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便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房山义和团运动纪略

戴家斌

作者按：房山是由原房山县与良乡县于1958年合并而成。因此，本文所述房山义和团运动包括原良乡县地区，鉴于资料不足，重点则在介绍良乡地区。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次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最早起源于山东。它是在反洋教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北京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房山地处北京郊区，是义和团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由山东、河北一带向京郊发展。4月初，义和团百余人携带兵器在卢沟桥一带散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教会的揭贴<sup>①</sup>。从5月27日开始到5月29日，良乡地区的义和团与涿县、宛平、黄村的团民一起，“将琉璃河至长辛店铁路焚毁，高碑店迄北各桥梁、各车站车辆焚烧殆尽”。过了三天，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翹紧急向慈禧报告：“涿州、良乡、宛平等地面、车道、栈房，均被直境窜来拳民焚毁。”与此同时，良乡县三合村(今房山区河北乡三合村)拳民与洋人教会发生冲突，洋人竟开枪将一拳民打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洋人教会的专横，更加激起房山人民的反帝爱国情绪。很快，义和团运动在房山境内发展起来，以至达到“各村无不从拳者”<sup>②</sup>。房山城关、良乡城关以及饶乐府、田各庄、石楼、大小十三里、肖庄、园武屯、窦店等村都组织起义和团来。与此同时，各村地主士绅也以“防御盗贼，保卫身家，守望相助”为由组织起本村的团练，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房山义和团运动，以良乡地区最为活跃。1900年6月6日，慈禧亲自点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翹到良乡一带视察，以“宣布朝廷德意”。刚毅等人由卢沟桥往南走，沿途查看。只见“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整个良乡地区，“各乡村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他们“虽烧符降神，迹近邪术，然市面买卖照常，尚无骚乱。”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参加范围之广泛，连十岁上下的儿童都卷入到运动中去了，使刚毅等人惊呼“诛不胜诛”。运动发展到这样广泛的程度，加之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使清政府意识到不能对义和团运动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了。在主剿派与主抚派经过多次争论后，终于在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由慈禧亲自决定，改变过去对义和团运动“严加剿办”的政策，责成刚毅、董福祥等人亲自开导，将拳民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样，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局面正式形成。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房山良乡地区义和团的发展壮大，对清政府由“剿办”向“招抚”方向的转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房山的义和团员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不论男女，都把辫子盘在头顶上，梳成一个小抓髻，老百姓称之为“抓髻团”，也叫义和神团。各村都设有坛口，坛口的负责人叫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一般由本村富户或有文化的人担任。良乡地区的总坛设在大十三里村，按阴阳八卦，称之为“乾”字团，总负责人称之为正、副团董，住在园武屯村三官庙里的一位姓李的老道任正团董。这名老道是由北京最大的道教胜地白云观派下来的。副团董由曾在良乡县衙当过经房负责人的孟守田（字金堂，良乡园武屯村人）担任。

据老人回忆，义和神团平时训练主要是练排刀。练习时，一伙团民集中在一大空场上，先由师兄焚表敬请二郎神“附体”。待二郎神真正“附体”后，他们就光着膀子，一手拿一根柴禾棍横在胸前，另一手拿着大刀反复地朝胸前的柴禾棍上砍，边砍边念咒语，直到把柴禾棍砍断，胸前留下一道砍过的白印。如此反复多次，他们坚信神灵附体后可以刀枪不入。当然不是每个团民都可以请得神灵附体的。一般的说，只有师兄等少数团民才能练得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往往是刀砍数十下而不伤一点皮毛。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吸引更多的团民投入这场运动中。有不少团民因练得不得法或功夫不到家而在刀下丧生。这种练习，近似于现代的硬气功。焚表、念咒、神灵附体等仪式，只不过是迷信活动掩盖下所作的表演前的准备而已。这种功夫，作为强身健体，防身护卫，当有一定作用。但以赤膊之身来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就显得近似于神话了。所以，当义和团失败后，良乡地区的老百姓唱道：“义和团，瞎胡闹，就怕鬼子的搂搂炮。”老百姓的讽刺，只看到这种封建迷信无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而在这种迷信后面蕴藏着的反帝爱国激情，却是这种迷信活动的本质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迷信活动，“既是农民小生产者愚昧落后的表现，又是当时联络下层民众保国的一种有效手段；‘拳拳’说到底是一种鸦片剂，但在神秘面纱的背后，又蕴藏着灼热的置生死于度外的反帝爱国精神<sup>①</sup>。”

据老人们回忆，义和团闹得最喜欢的时期，团员们是顾不上种地的，清政府每月发给团员们一点粮食，由团员们到良乡县衙去领。这点粮食对日夜操练的义和团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艰苦的操练，于是就有了老百姓称之为“吃大户”的现象。其方法是由师兄写一张条子，指定某大户应交粮食多少斤，团员们以此为据，拿着盛粮用具，呐喊着涌进被指定的人家。见了粮食就拿，直到大家认为满意了为止。被指定的大户不得反抗或讨价还价。这种“吃大户”现象义和团员们称为“均粮”。“均粮”的对象一般是当地的大户、富户。当时的歌谣唱道：“眼望东南山，惊动义和团，老天××××，先灌麦子后灌米。”义和团员们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表面上为维持日常生活和操练而产生的“均粮”斗争，实质上是农民群众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进行的一种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形式。

义和团成份复杂，参加者所抱的目的各不相同，正如仲芳氏在《庚子纪事》中所说：“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艰难、入团而求安饱者；有豪富之人，恐遭团民欺讹，目立坛场而谓保家者<sup>②</sup>。”这些良莠不齐的众多团民，统统集合在反帝爱国的大旗下。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士绅也或明或暗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良乡县义和团的领导人是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白云观老道和在良乡县衙当过差的地方首富孟守田。而地处偏僻、山多民贫的房山县与交通方便、消息灵通的良乡县不同。地主士绅似乎并未投入反帝爱国的洪流中来。鉴于资料有限，我们无从知道房山县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谁。但《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记载：房山南关举人陈智和饶乐府士绅刘琴甫因“拳匪起事，各村无不从拳者”而创办团练以“自救”。周口村的庠生常履贤也“创办本村团练”，以对付“拳匪之乱”。从“各村无不从拳者”的记载来看，房山义和团的规模当是相当大的。据直隶布政使廷雍向清政府的奏章中称：义和团民刘房山县城“眈眈虎视”，致使房山县城“四门屯闭，时逾两月”。在这两个月中，“县衙虽昼夜严加防备”，但还是弄得“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1900年8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8月15日凌晨，慈禧挟光绪皇帝

仓惶西逃，同日，大学士荣禄与董福祥在得知慈禧和光绪西逃后，两人在追赶中“于良乡行次相遇，随即会同熟商”，经过两天的努力，收编了被冲散的散兵游勇，并“收齐所部马队，尽数带往，尅期二十三日(即8月17日)由良乡开拔”，为慈禧保驾。这样，良乡地区在八国联军未到之前，实际上就已被清政府放弃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于8月17日特许公开抢劫三天。随后继之以私人抢劫，北京城遭到八国联军空前的洗劫。9月7日，慈禧将八国联军的侵略归罪于义和团运动，下令将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株”。至此，义和团结束了被清政府利用的历史，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义和团。

1900年10月4日，顺天府尹王培佑向清朝廷报告：“西路良乡城关、榆堡、庞名庄等村镇，俱焚烧殆尽。”良乡、黄村一带被八国联军烧毁，紧邻的房山县城也惊恐万状，昼夜防备，不敢稍有松懈，并不时派人到良乡城打探消息。就在王培佑向清作府报告的同一天，良乡县衙派专人到房山县报告：“法国来兵队伍陆拾人，赴良、房、涿一带，出示安民。”望房山县衙早做准备。次日，即10月5日，法军若干人，由良乡开赴房山境内，并在石梯村驻扎。到10月14日，“良乡、涿州等地均遭洋兵蹂躏”，顺天府尹王培佑连印信都来不及取出就仓惶出逃，以致于清政府只得用大兴县衙的印信“暂行盖用，以昭信守。”至此，房山、良乡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据《房山县志》载：“7月，京师陷，溃兵到房……法兵据县城，民教有仇者思报。”同时还记载房山县城赵家胡同任秉璋之妻，年仅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六年因拳乱，英、德军由易来房，逃者士女如云。氏慨时局如斯，桃源难觅，奔入后园投井卒。”从这记载看出，房山城曾先后遭到从良乡方面入境的法国军队和由易县、涑水方面入境的英、德军队的洗劫。

京城失守，顺天府尹弃印逃跑，地方政府陷入瘫痪之中。房山、良乡各乡镇士绅纷纷组成民可以维持地方秩序，并与入侵的八国联军及溃散的清政府兵丁周旋。周口村士绅代表民团与到村勒索牛只的洋人讨价还价，被洋人开枪打死<sup>⑥</sup>。地主士绅们组织的民团只是自守家园；而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房山地区的义和团则在清政府变招抚为镇压的恶劣条件下，对入侵的八国联军备起反抗。据《良乡县志》记载：“光绪庚子八月，拳匪占据城中，联军来攻。从燎石岗轰以巨炮，城遂陷，拳匪半遭屠戮，良民被害者亦多。房舍亦毁十之八九，城垣皆残破，门楼半就倾颓，东南隅奎楼尤令人惨目。”可见，良乡县知县率官兵逃跑后，防守良乡的重任落在义和团的肩上。据良乡地区老人们的回忆，当时防守良乡城西门的总指挥是孟守田。当八国联军攻城时，开始只是步兵端着枪，架起云梯往城上爬，结果被守城的义和团们砍死不少，后来，八国联军从长辛店调来大炮，架设在良乡塔坡上，对良乡县城猛轰，这样八国联军才得以进城。良乡城失守后，义和团的团董李老道逃到上方山，后来被捉住，官兵用烧红了的铁条从前胸穿到后背，后背还露出三寸铁条来，即使这样，他还不叫饶，只喊口渴，说：“给我几块西瓜吃。”结果，吃了三块西瓜从容就义。副团董孟金堂(守田)在良乡失守后逃往窦店望楚村的弘恩寺内躲藏，后来又从弘恩寺转到妙峰山躲藏，一直到去世。其它各村的师兄们，有的逃往上海，有的各自回家躲藏，房山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北京义和团运动是整个义和团斗争的核心，而房、良两地的义和团斗争是北京义和团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山人民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

- 1、《义和团档案史料》
- 2、《房山县志》
- 3、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 4、《庚子纪事》
- 5、《房山县志》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奕绘贝勒的煤炭诗及其它

潘惠楼

读《房山文史资料》第七辑赵思敬先生的文章《大南峪奕绘园寝》，很受启发，使我想起一首奕绘所写的房山煤炭诗歌。诗名为《挖煤叹》，诗曰：

山坳一簇人耶鬼？头上莹莹灯烟紫。  
木鞍压背绳系腰，俯身出入人相尾。  
穴门通狭中能容，青灰石炭生其中，盘旋蚁穴人如虫。  
移时驼背负煤出，漆身椒眼头蓬松。  
我立穴上看，深怜此辈苦，  
因令僮仆前，转责煤窑主：  
汝坐享其利，视彼陷网窟，  
人无恻隐心，何以为人父。  
窑主依我言，按分青钱数，  
数付挖煤人，令彼去息午。  
挖煤人得钱，足蹈而手舞。

此诗为奕绘《妙莲集》诗集中的一首。据其后人金启宗先生所著《漠南集》书中介绍，《挖煤叹》所叙内容为房山县大灰厂附近煤窑状况，乃奕绘亲见亲历挖煤情景写成。全诗明白如话，即描述挖煤人劳作的艰辛，又写出了窑主对挖煤人的残酷剥削，及作者对挖煤人的怜悯与同情。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之心。

奕绘为清高宗皇帝乾隆曾孙，其祖父荣纯亲王永琪为乾隆第五子，其父荣恪郡王绵亿为永琪第五子。世袭罔替，奕绘于嘉庆年中袭贝勒爵位，戴三眼花翎，并奉派管理正红旗觉罗学事务，做过散秩大臣，管理宗人府、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饮天监事务。奕绘自幼生长于满洲宗室宦宦之家，钟鸣鼎食，宝马金裘，居然能够深入乡野，写出《挖煤叹》诗，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挖煤人予以讴歌赞颂，实属难能可贵。然观其奕绘一生，则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为之。

奕绘原名奕铭，其弟奕棨。对此，嘉庆六年谕旨“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联命名，绵亿私用金字偏旁为其两子取名，不似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于是将绵亿降职“退出乾清门，到外廷当差，以示愧励”，“奕铭著改奕绘，奕棨著改奕缤，奕浚著改奕绮”。后嘉庆帝自觉对兄弟处之太重，又将绵亿召回乾清门内。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攻入大内，杀至嘉庆帝前，幸有绵亿在场，冒死相救，方才保住嘉庆。自此嘉庆帝才对绵亿等宗室日益信任重用。奕绘自幼耳濡目染，宦海沉浮，权力之争，深知为官不易，于是饱读诗书，耽玩典籍。十二岁即能诗为文。虽一生仅40岁而卒，但著述颇丰，多才多艺，在清室中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和王引之编过《康熙字典考证》，这在今世刊印流传的《康熙字典》编后中有较详记载。奕绘著作有《示章子》、《妙莲集》、《集陶集》、《明善堂集》、《明善堂集流水编》等。他述善于篆书，通晓拉丁文。载有《挖煤叹》诗的《妙莲集》计有诗85首，乃是其12岁至22岁时的部分诗作辑录。奕绘死后葬于房山县坨里乡北车营村外的大南峪内，其墓地为自己生前所造，用府中采园地两千亩所换得。其园寝为自己与侧室西林春夫人共同设计，分为十景，外有围墙咩城，内有三重院落，房屋64间。建筑座西朝东，

依山而上。其正堂之后的“清风阁”分为上下两层，每层五楹，在二层临窗凭栏而眺，风景绝佳。背后满目青山滴翠，东面远处沃野平畴，每至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清风阁后的山洼开阔地内即为奕绘墓宝顶，今仅为土包一座。奕绘墓旁原葬有其幼觴的子孙载同、溥棣、毓守、毓乾之墓葬，现已荡然无存。在清风阁前的正室内，曾供奉有奕绘与其妻妙华夫人和侧室西林春夫人牌位。

值得提的是奕绘侧室西林春，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西林春，字梅仙，号太清，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氏，乃乾隆朝大学士鄂尔泰之侄鄂昌女，与奕绘同年。其家因鄂尔泰获罪被贬入香山健锐营居住。西林春在荣王府中为奕绘姐妹当家庭教师期间，与奕绘接触，二人诗词唱和产生感情。然西林春祖虽获罪遭贬，但仍为满洲宦官宗族，依清宗室规定，嫁奕绘为侧室难以成婚。后终奕绘努力，西林春改姓顾后才被奕绘娶走为侧室。西林春著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其诗名被誉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清”，分列有清一代女词人之首位。成容若为纳兰性德，顾太清即西林春。顾太清之名西林改姓顾后由奕绘所起的名字。

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风景优美，曾是房山有名的游览胜地。《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本)有本邑人刘树铭的《游大南峪记》文，其中说大南峪：“春则野花吐秀，满谷幽香；夏则流水潺潺浮动，垂杆可钓；秋则半山红叶，艳若春花；冬则雪积苍松，林挺隙树。四时之景，无不可赏心悦目也”。奕绘后人金启综先生在1992年《燕都》刊物第五期曾对其先祖奕绘地园寝做过专文介绍。在奕绘墓兄及奕绘之父荣恪郡王绵亿的丰台区大灰厂北宫村墓地附近，都曾有人开采过煤炭，特别是奕绘墓所在地的大南峪山后，古时不但开了许多煤窑，而且是房山大石河谷所产煤炭销往京城运输的重要驮运山路。奕绘无论是到大灰厂绵亿墓谒拜或到大南峪为自己踏勘园寝，都可看到京西采煤景象，因此奕绘能够写出如此真实反映挖煤人生活的诗歌《挖煤叹》，也就不足奇怪了。

现今，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的关牒、石桥、房屋等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墓地附近万木森森，一片清凉世界。墓地前方左侧台上的明嘉靖年间建万寿寺(也叫天台寺)贵址基础尚存，寺内两块仆地石碑，文字尚清晰可辨。

大南峪奕绘园寝是北京历代王室成员陵墓保存较好的坟苑，也是房山县境内古树名木比较集中的地区，这同北京矿务局化工厂的大力保护是分不开的。1949年5月，京西煤矿公司成立伊始，就在大南峪设立了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工厂，将大南峪四周用铁丝网为栏进行封闭，并设有武装警察看守化工厂，不许闲人进入。后大南峪矿用爆破器材生产厂迁到大南峪外的水峪村，改为北京矿务局化工厂，大南峪又成为化工厂生产的煤矿用火药仓库，直至现在。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澶渊之盟与房山石经

杨亦武

—

北京房山西南的隋唐古刹云居寺，是一座巨大的石刻佛教经籍宝库。云居寺刻经始于隋大业年间，历唐辽金元明，长达一千余载。计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所刻经版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

石，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寺内的压经塔下。镌刻石经在北齐时已有先例，如山西太原风峪刻有《华严经》、山东泰山石经峪刻有《金刚经》、徂徕山刻有《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有《维摩诘经》、《胜鬘经》等。此后历代也时有所为。但是此类刻经多为一时之举，刻石寥寥，所刻佛经不过一经数经，因而均无多大影响。房山石经延续时间之长，工程之浩大，所刻经石数量之巨、佛教经籍之完备，则冠绝古今，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房山石经巨大的宗教、文化、历史价值难以估量。对此，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国人视房山石经为“国之瑰宝”，房山石经镌刻、珍藏之地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 二

纵观房山石经，辽代石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一，在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史上，辽代石经起着起废崇兴、承前启后的作用。房山刻经自隋大业开始，到唐末告一段落，进入五代因战乱而止。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938)后，辽人统治了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至辽太平七年(1027)，停顿了一个世纪的房山刻经事业在圣宗的支持下得以恢复。此后，世代相袭，从未间断，至明末而终。

从隋大业到唐末，房山刻经不过三百年左右时间。如果不是辽人恢复了五代以来中断了的刻经事业，使之延续下来，房山刻经史将缩短约七百年。如此，房山石经也就失去了其时代久远之特色。房山刻经若是作为兴于一朝(隋)、止于两代(唐)的隋唐旧事，那么它将和北齐时代的刻经一样，所留下的不过是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而已。

其二，从房山石经的数量上看，辽代石经与唐代石经相伯仲，居主体地位。贮藏石经的石经山九洞，除五号洞(即雷音洞)为隋大业及唐刻石经、六号洞为明刻石经外，其它七洞均贮有辽刻石经。其中一号洞藏经四十九种，多为辽刻，只有唐刻四种、金刻一种。二号洞藏经九十种，唐刻六、七种，金刻一种，辽刻不少于八十二种。三号洞藏经十四种，主要为唐代刻经，辽金刻三种。八号洞藏经六十九种，多为唐刻，辽金刻十二种。九号洞藏经二百二十一种，多为唐后期刻，辽刻五十三种。云居寺压经塔下藏经五百四十九种，均为辽金刻。在云居寺所藏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石石刻经版中，辽金经版过万，在万余辽金版中，辽代经版在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可见，在浩如烟海的房山石经中，辽代石经占很大比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辽代石经，房山石经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其三，辽代石经促成了房山石经的完整。

辽代刻经之初乃是“补缺续新”，即补唐人未终之石经残卷，续唐人未成之四大部经数。

《大般若经》是隋唐刻经中最大的一部，长达六百卷，唐人自天宝元年(742)刻造，终唐之世只完成五百二十卷。此五百二十卷中第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等卷亦岁久残损。辽人先于太平七年(1027)补刻残损经卷，又于重熙十年(1041)补齐五百二十一卷至六百卷刻成全部《大般若经》。如果没了辽人的努力，唐人累代镌刻的《大般若经》终将是一部石经残卷。

此后，辽人又续镌《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二卷。至此，四大部经数续完。

辽以前的隋唐两代，虽刻了不少石经，其中包括许多大部头经典，如《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正法念处经》等。但从所刻佛经的内容看，均以经为主，律、论两类则多未顾及。辽代石经则经律论并刻。

如辽大安末年(1093—1094)，通理大师主持刻经四十四帙，计经石四千零八十片。其中选刻大乘经三帙，

律五帙,大乘论则三十六帙。由是补足前缺,使佛经之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

辽代刻经的最后年代是保大元年(1121)。通理弟子善伏完成石经十三帙,一百余卷。

有辽一代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近一个世纪的刻经,构筑了房山石经的藏经体系,使房山石经成为大乘经、律、论三藏、小乘经、律、论三藏具全的佛教经籍宝库。如果没有辽代刻经,房山石经将是隋唐遗留的体系肢离的零散经籍,那么,房山石经的价值也就逊色多了。

其四,辽代石经使《大藏经》善本《契丹藏》得以保存。

藏经之刻,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北宁在益州(今四川)雕造,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世称《开宝藏》或《蜀藏》,此藏经早已失佚。在《开宝藏》刊刻稍后,北方契丹国(即辽)也编刻一部《大藏经》即《契丹藏》,约始于统和年间(983),至清宁十年(1064)编成。和《开宝藏》一样,此藏经也早已失传。很久以来,世人对《契丹藏》的面目一无所知,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残本十二卷,才了解到《契丹藏》的局部。后经专家将此十二卷《契丹藏》与房山辽刻石经对照,发现其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证实,辽代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是《契丹藏》的覆刻。权威界认为,这一发现,不独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足见《契丹藏》在佛教及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之大。

在木刻本失传的情况下,使《契丹藏》得以保存下来,这不能说不是房山石经的一大功绩,而这个功绩应完全归于辽代。

关于辽代石经,著名专家周绍良先生曾有精辟论述,他在《房山石经与〈契丹藏〉》一文中指出:“房山石经之镌刻,固然肇始于隋唐,但继起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却是辽代。没有这一代人的努力,隋唐时代的创举,仍然不过像响堂山的刻经一样,表现不出它的特色来。”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辽代石经也就没有房山石经。

### 三

考幽州史,辽会同元年(五代晋天福三年<38>)晋遣使于辽,献燕云十六州图籍,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归辽人统治。辽人恢复云居寺刻经的太平七年(1027),整整是辽人统治幽州地区的第九十个年头。此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这就是“澶渊之盟”。

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辽萧太后率辽兵大举攻宋,深入宋境,宋真宗与宰相寇准也亲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辽宋订立和约,由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国。因澶州亦称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辽人正是澶渊之盟(1004)以后(1027)恢复云居寺刻经的。

而从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938)到澶渊之盟(1004),辽人统治幽州地区已达半个多世纪。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辽人何以未恢复房山石经的雕刻呢?这就需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历史了。

五代晋初(938),辽人入主幽州后,幽州地区的战乱局面并未因此而结束。相反,由于幽州为辽人所据,幽州地区成了中原政权与辽人争夺之域,辽人或为了确保幽州而南伐,中原政权或为收复幽州而北征,幽州地区干戈屡兴。其中包括辽太宗灭晋(943—946),中原汉民起义抗辽(947),周世宗北伐(959)等。五代结束后这种局面更为激烈。北宋建国之初,就把收复燕云十六州列入统一大计,宋太祖特设“封樁库”,贮积金帛,和则作为赎取燕云的贷价,战则作为攻取燕云的兵费。自宋辽对峙形成,幽州局部战事时有发生,而在澶渊之盟以前的宋辽交战中,辽人实处被动不利的局面,宋人曾先后两次大规模进攻幽州。一次是“高粱河之战”,辽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后,乘胜移师河北,幽州外围的易涿顺蓟诸州望风迎降。宋太宗亲临指挥攻打幽州城,围城十五日,城几下。另一次则是“雍熙之役”,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宋以曹彬为统帅分三路北攻燕云,曹彬出雄州,歧沟、涿洲、固安、新城皆克;田重进出飞狐,沿

桑干河进攻幽州背后的军都山；潘美、杨继业出雁门进攻云州。

宋人的进攻，给幽州以很大威胁。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萧太后攻宋的澶渊之盟一役，正是辽人为确保幽州，解除宋患所作的军事努力。

因此，在澶渊之盟以前，辽人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确保幽州的战事；连年的战乱，使幽州地区民力凋敝；战祸兵劫且直接殃及云居寺。云居寺能“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已然不易了，更无力恢复石经的雕刻。

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辽人于应历年间曾较大规模修复云居寺，其原因是寺院经“风雨之坏”及“兵火之残”。这表明，此前战乱确曾毁及云居寺，并致使云居寺年久失修。修复过程中，重建殿宇超过六十五间，可见战争对云居寺破坏之严重。应历年间云居寺所以得以重修，恰是因为辽太宗灭晋后，幽州地区出现十年（948—958）相对的和平稳定。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原至沧州指挥后周军北伐幽州。幽州地区战端再起。辽与后周的战事似应当影响云居寺的修复，所以到应历十四年（964），寺主谦讽使草结工程。翌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其事。结果，此碑“顷因兵火，遂至伤缺”。（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

应历十五年（965）后，幽州地区殃及云居寺的首次战事乃是高粱河之战。是役，宋太宗率兵渡易水、占金台，进幽州城南。云居寺为北宋大军必经之地。兵戎所及，寺院为燹，王正碑“遂至伤缺”。

此后的雍熙之役，云居寺亦有被兵迹象。据《大清一统志》记载：“雍熙三年，李继宣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孤山口，地名。在云居寺北。宋将李继宣与辽兵交战的拒马河，当是云居寺西南的南尚乐至张坊一线的拒马河段。李断宣追击辽兵至孤山口，云居寺正当其途。处于交战场途的云居寺，必难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应历十五年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到统和二十三年（1005），由其子王教“出俸钱再修”（即重镌），可见此碑破损之甚、云居寺寺战祸之甚。再修王正碑的统和二十三年（1005），在澶渊之盟（1004）翌年，此碑则损于澶渊之盟二十五年前（979）的高粱河之战。二十五年不得完一碑之工，何况恢复规模巨大的刻经事业呢？

1956年至1958年，在对云居寺石经整理中发现，辽代经版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十三年（995）刻《般若心经》残片。这足以表明，澶渊之盟以前，辽人确曾企图在云居寺恢复刻经，但没有成功。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间化干戈为玉帛，百年和好，终辽之世无战事。幽州地区也因此社会太平。《辽史·圣宗本纪》这样载道：太平五年（1025）十二月，圣宗至南京（即幽州城），“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事在澶渊之盟以后二十一年、辽人恢复石经雕刻的前两年。

辽人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的云居寺刻经事业，正是由于澶渊之盟结束了战争，实现了和平，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结果。如果没有澶渊之盟，辽宋间的战争持续下去，辽人在云居寺恢复刻经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澶渊之盟也就没有辽代石经。

如果说没有辽代石经就没有房山石经，那么没有澶渊之盟也就没有房山石经。

注：

- 1、本文主要参考书目：《房山石经之研究》、《辽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 2、文中涉及石经山九洞排列顺序，依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时编次，各洞藏经情况参见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羊头岗之战

贲麟

羊头岗，西南距区政府驻地3.5公里，东北临大石河至新镇3公里，东南2.5公里为马各庄。因有丘陵酷似羊头而得名，后其下形成村落，名羊头岗村。

据《房山县志》记载，五代时期羊头岗曾发生后晋和大燕的一场战争。《旧五代史卷八·诏书四·庄宗纪·第二》：“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军于羊头岗。”《唐书·三十二·列传第八》载：（后唐庄公八年）八月，刘守光僭号大燕皇帝。十二月，晋遣周德威将三万出飞狐似击之……单廷珪督精甲万人出战（单廷珪，唐本纪作单无敌），初，廷谓左右曰：“今日擒周阳五”。即临阵见德威，廷珪单骑持枪躬追德威，垂及，德威侧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奋槌击坠其马，生获廷珪，贼党大败，斩首三千级，获大将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另据《资治通鉴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太祖乾化二年）载“……燕主守光遣其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岗（《考异》曰，《庄宗实录》作羊头岗），廷曰：‘今日必擒周阳五（即周德威）以献……’。见德威于阵，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槌反击廷珪坠马（单廷珪马方疾驰，势不得过，周德威身避其锋，马差过前，则德威在枪里，奋槌反击，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坠地，格斗之势，刀不如棒，谓此也），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珪、燕之骁将，燕人失之，夺气。”

据新五代史《唐臣传·第十三》记：“周德威，字镇远，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县）人，为人勇而多智，能望尘而知敌数。其状貌雄传，笑不改容，人见之，凛如也，事晋王为骑将，其小字阳五，当梁晋之际，周阳五以勇闻天下”。

羊头岗之战以后晋兵大胜，燕兵大败主将被擒结束，但战争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十八年以前。当时，燕主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是卢龙（今北京、河北北部一带）节度使李匡威的部下，带兵成边以久成无人替换为由起事，攻击已谋兄位的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兵败逃后晋，受到晋主李克用的厚待。公元905年，在刘仁恭鼓噪下，李克用亲自带兵攻破幽州，留下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又假借唐昭宗之名任命刘仁恭为检校司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由于当时后晋正在和中原最大割据势力朱温（后梁）连年苦战，刘仁恭趁机背叛李克用，游离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养兵蓄锐，渐成气候，又击败李克用来讨伐的军队，兵锋益盛，遂有吞并河朔之志。

自唐朝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幽州的战略地位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致到谁据有幽州，谁就可进图中原，甚至统一中国。（我国的辽、金、元、明、清均是先有幽州，后进图中原。而当时刘仁恭的势力范围北到辽宁南部，南到沧州，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山脉，使他据有地理上的优势。但此时的刘氏与后梁主朱温，晋主李克用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统治手段极其残暴，生活上十分奢侈腐败，他们还不断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人民对他们刻骨痛恨。特别刘仁恭父子，更是残暴奢侈异常。如公元906年，朱温发兵攻燕属下的沧州（今沧州市南），刘仁恭为挽败局，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把幽州15至70岁的男子，不分老弱病残贵贱，全部自备军粮赶上战场，闾里为之一空。为防止士兵逃走，他还发明了在人身上刺字的办法，对兵丁在脸颊上“定霸都”，对士人在手臂上刺上“一心事主”。刘氏父子发明的酷刑是把人放在铁笼子里，四面用火烧烤，然后用铁刷子把人的面皮一层层刷下来，而且每次刑必用此法。其凶残可见一端。而在此同时，刘仁恭为了自己能长生不老和荒淫享乐，在今我区的大安山大造离宫别馆和进行豪华的装修，到处抢夺民女艳妇在这里供其淫乐。并拜道士王若纳为师，以求得长生羽化之道，为敛聚钱财，他用胶泥做钱，

换下老百姓的铜钱运往大安山，然后在西窖附近挖山洞把铜钱藏起来，并杀死所有参与此事的工匠以灭口。

不久，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因在大安山与刘仁恭之妾罗氏有染，遭刘仁恭责打，刘守光借机自立为幽州节度使，将兵攻打大安山，掠刘仁恭囚于幽州，终于志满意得，自称“我大燕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我南面称帝，谁如我何？”于公元912年旧历八月十三日，做了大燕皇帝。此时晋主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南面对梁战争已取得明显优势，终于有力量解决北方幽州问题，派大将周德威于公元913年初出晋阳，经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飞狐（今河北涞源）进攻大燕，导致晋燕羊头岗之战。

据史书记述，羊头岗之战以后，取得大胜的晋军，在周德威指挥下，进军良乡，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夺气，德威之师，履收诸郡，降者相继，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可见再无大的战事，大燕各地守军，几乎已到望风而降的地步，后来，晋主李存勖亲自出马，擒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

羊头岗之战的影响归纳起来说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刘氏父子被擒杀，晋主李存勖的势力大增，既报了十几年前刘氏恩将仇报之恨，又减少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大梁。十年之后灭掉大梁，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二代——后唐。二是燕地的士人和百姓为逃避战乱和杀戮，纷纷逃往北方的契丹领地（今辽河一带），带去许多农业、手工业、筑城、纺织、军事技术，加快了契丹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建立国家的过程。公元915年，契丹部落首领耶律阿保机终于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辽的前身——大契丹国，并开始进窥中原，使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袁枚及其房山怪异故事

赵思敬

按语：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乾隆元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其间热心于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广采游心骇耳之事”。作者曾骑骆驼游良乡两日有余，写下二首《良乡雾》的诗作（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由此可知，此行是为“广采”志怪故事而来，否则，在其志怪小说《子不语》中就不会记述三则房山、良乡地区的志怪故事。

作为二百多年前流传于民间的这些“奇闻”，似可作为房山地区的民间文学史料，因此撰文介绍。

房山地区历史悠久，民风淳厚，志怪故事颇多。历代文人雅士屡有搜集。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他的志怪笔记小说《子不语》中，就记下了几则房山地区的志怪故事。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书记载：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后号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日。卒于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十七日，享年81岁。

乾隆元年，袁枚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散馆历任溧水、江浦、江宁知县。”后归隐于江宁小仓山，所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二十多种著作。与纪昀齐名，有“南袁北纪”之称。

为搜集民间志怪故事，袁枚曾骑着骆驼小住良乡。在其《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中，有两首咏《良乡雾》的诗，其一为：“不雨征鞍湿，方知雾里行。晓花难辨色，溪水近无声。对面人千里，终朝天五更。前程原

似梦，何必太分明”；其二题为《次日雾更大》：“连宵驻背锦模糊，写出洪荒一幅图。此际群仙高处看，可知下界有人无。”

袁枚的良乡之行，不管是路过还是游玩，肯定“广采”了民间的“怪异”故事。因为，记述房山、良乡地区的三个故事恰在前几卷中。《子不语》计有二十四卷，后又续作十卷。纵观全书，可说行文率意，长于讽喻。

袁枚笔下的房山怪异故事，第一篇选自《子不语》卷二，题目叫《蝴蝶怪》，原文如下：

京师叶某，与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为六旬寿期，叶骑驴往祝。过房山，天将暮矣。一伟丈夫跃马至，问将何往。叶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表也，吾将往祝，盍同行乎？”叶大喜，与之偕行。丈夫屡蹊其背，因让前行，伪许而仍落后。叶疑为盗，屡回顾之。不甚辨其状貌，但见电光所烛，丈夫悬首马下，以两脚踏空而行。一路雷与之俱，丈夫口吐黑气，与雷相触，舌长丈余，色如朱砂。叶大骇，卒无可奈何，县隐忍之，疾驱至王四家。王出与相见，欢然置酒。叶私问与路上丈夫何亲。曰：“此吾中表张某也。现居京师绳匠胡同，以熔银为业。”叶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见眼花耳。酒毕，叶就寝，心悸，不肯与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请一苍头伴焉。叶彻夜不寐，而苍头酣寝矣。三鼓灯灭，丈夫起坐，复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叶之帐，涎流不已，伸两手持苍头啖之，骨星星坠地。叶素奉关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忽然有钟鼓声，关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击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车轮，张翅拒刃，盘旋片时。又霹雳一震，蝴蝶与关神俱无所见。叶昏晕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启门视之，具道所以。地有鲜血数斗，床上失一张某与一苍头矣。所骑马宛然在厩，急遣人至绳匠胡同踪迹张某，张方踞炉烧银，并无往易州祝寿之事。”

看完这篇故事，使人毛骨悚然，房山的“蝴蝶怪”不仅幻为人形，且口吐黑气，舌长丈余，它先持“苍头”啖之，后又敢与伏魔大帝盘旋。这样的“怪”，的确少见。再看《子不语》卷六的《獮》，更会使人吃惊。

房山有獮兽，好食铜铁而不伤人。凡民间犁锄刀斧之类，见则涎流，食之如腐。城门上所包铁皮，尽为其啖。

篇幅虽短，但“獮”是什么动物颇费猜疑。先看古书上的记载，《说文》云：“獮，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尔雅·释兽》载：“獮，白豹。”郭璞注：“獮似熊，小头，库脚，黑白驳，熊舔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又据《简明生物学词典》介绍：“獮，哺乳纲，奇蹄目，獮科。体形略似犀，但较矮小……。”

獮，这种动物现在不但在房山已经消失，在国内也已绝迹。也可能由于獮的样子怪异，所以人们才编出它能食“犁锄刀斧”的故事，但人对獮并无敌意，因为它只“好食铜铁而不伤人”。再看《子不语》卷十八的另一篇短文《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师大旱。有健步张贵为某都统递公文。至良乡，漏下出城，行至无人处，忽黑风卷起，吹灭其烛。因避雨邮亭，有女子持灯来，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饮以茶，缚其马于柱，愿与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绸缪达旦。鸡鸣时，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体疲，乃复酣寝。梦中觉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卧荒冢间，大惊。牵马，马缚于树上，所投文书已误限期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统，虑有捺摺情弊，都统命佐领严讯。健步具道所以。都统命访其故，知为张姓女子，未嫁与人通奸，事发羞忿自缢，往往魔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獠形披发，一足行者，为兽魃，缢死尸僵，出迷人者，为鬼魃，获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启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体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魃”，是古代传说中造成旱灾的鬼，所以，烧魃而后下雨。这种传说由来已久。《说文·鬼部》曰：“魃，旱鬼也。”《诗·大雅·云汉》有：“旱魃为虐，如恢如焚”的诗句。

袁枚笔下的这个“旱魃”，指的不是“旱神”，而是鬼妇。这与《篇海类编·人物类·鬼部》的“魃鬼妇”的记载是一样的。三个“鬼话连篇”的故事看完，并不是让人相信世上有鬼，这一点，连袁枚自己都不信，他在《子不语·序》中说：“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可见，

作者写《子不语》的目的是因为“文史”之外，无以“自娱”，才写了这本书。但是，袁枚无意中记述的二百多年前房山地区的这三个民间故事，为我们探寻房良地区怪异故事在民间的流传提供了珍贵史料。

参考资料：

- 1、《清史稿》
- 2、《清史列传》
- 3、《小仓山房诗文集》
- 4、《笔记小说大观》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高克恭与《房山集》

栗景鸿

大凡对中国绘画史稍感兴趣的人，对以“擅画墨竹、造诣精绝”（《中国人名大辞典》语）的元代著名画家高克恭的名字不会陌生。他曾与赵孟頫同时在北京任职，后来两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受赵孟頫影响，高克恭对书画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悟性极高，善作山水、墨竹。尤其喜爱董源、米芾的画风，卷面云烟流动，淡雅有致，富有诗一般的韵律，生机盎然。他的墨竹既重形，又重神，孤高清秀，出人意表，虽是写竹，实是写人，落笔潇洒，秀雅中人。赵孟頫称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所作看似游戏，却能不流于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画发展的进程中，高克恭的美术成就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有关高克恭这位曾与房山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画家的画风与艺术成就，《房山文史资料》第二、七辑曾先后刊载的戴家斌和王书樵二位先生的文章，都作了周详精当地介绍，在此笔者不再赘语。现就自己所知高克恭的生平资料作一简单补充，并重点介绍一下他的一部诗集——《房山集》，也许能帮助读者对高克恭的艺术成就有个较全面的了解。

—

戴家斌先生在《房山的一代名人——高克恭》一文中讲“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生于1248年，卒年不详。”查孙俚工编、民智书局1931年出版的《文艺辞典》及谭正璧编、光明书局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高克恭“生于宋淳佑八年，卒于元至大八年（公元1310年），年六十三。”1991年8月出版的《北京古今名人辞典》中“高克恭”条更是明确地记录着高氏卒于1310年。

戴先生在文中讲高克恭“晚年居住房山，官至大中大夫刑部尚书，故而史称高房山或高尚书。”确切地说，高克恭晚年并未“官至大中大夫刑部尚书”。查清人顾嗣立所编《元诗选》续编中记高克恭“……初仕为省郎，出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大德初，为御史，官至刑部侍郎卒，追赠刑部尚书，谥文简。”清末文

人陈衍辑撰的《元诗纪事》一书中“高克恭”条也介绍道：“克恭字彦敬，其先西域人，后居燕之房山。初仕为省郎，官至刑部侍郎。卒追赠刑部尚书，谥文简。”由此可知，“刑部尚书”一职当为高克恭卒后追赠，是个虚职。

## 二

关于高克恭的诗歌创作，许多读者也许还不知道这位享誉画坛的一代名人曾有一部诗集行世，这部诗集就是《房山集》。《北京古今名人辞典》中载高氏“工诗，著有《房山集》存世”。笔者手中有清人顾嗣立所编的《元诗选》第二集(共两册)，其中“丙集”部收录有《房山集》中部分诗作，从中可略窥高氏的文学造诣，虽然这只是高氏诗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元诗选》中共收高氏五言律诗二首、七言律诗两首、五言绝句四首、七言绝句十三首，合计二十一首。集前有编者小序，简略地介绍了高氏的生平，同时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评注。说高克恭“为诗不尚钩棘，自得天趣。柳道传尝谓高公画入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如王摩诘在辋川、李伯时泊皖口舟中，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顾嗣立所评虽值得商榷，但仍可从中得见高氏诗才有别于旁人之处。

就《元诗选》所收高氏二十一首诗的内容看，大体上分为题画诗、赠答诗和游记诗三类，均未有直接涉及房山地区的作品。《房山集》中的“房山”二字，似应指高克恭的号，并不是指诗集中所写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房山地区”。因为以作者的名、字、号及其居室、斋号等命名文集，是中国历代文人文学创作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下面从三方面看看高克恭的诗作：

**题画诗** 高克恭作为一位名画家，作画之余，自然会有与友朋相互题诗赠画之类的文人雅举。顾嗣立十分欣赏高氏这类诗句，尤其推崇高氏的“木落秋雨空，天寒远山静”、“峭寒留剩雪，暮影入浓云”、“云气外无出路，水声中有人家”、“冷光湿翠相转处，曾向庐山月下来”、“青山万叠云无屋，中有仙人问月台”，认为“具有妙思”。这类诗在《元诗选》中共收录了六首。下录其中三首：

### 《题管夫人竹窝图》

云梢露叶秋声古，万玉丛深翠蛟舞。  
此君拟结岁寒盟，拄笏相看立烟雨。  
过雨山窗斜映日，带烟霜节总宜秋。  
冻雷进出千崖翠，勒此高歌傲素侯。

### 《种笔亭题画》

积雨暗林屋，晚风晴露巅。  
扁舟入蘋渚，浮动一溪烟。

### 《赵子昂为袁清容画春景仿小李》

春林如染缀溪容，几处幽居倚碧峰。  
不是两翁情话久，白云深杳未能逢。

**赠答诗** 这类诗在《元诗选》中收录了两首，通过吟咏与友人之间的交往，体现出诗人珍重友情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流露了作者畅意于江湖、寄情于山水的率达之情。

### 《题怡乐堂为赠善夫良友》

君家华堂号怡乐，已见檐楹佳致作。  
时张图画玩江山，晴敞窗棂咏风月。  
有书教子知义方，有席延宾酬学觚。  
天壤不知更何乐，松门醉倚看斜阳。

### 《赠英上人》

为爱吟诗懒坐禅，五湖归买钓鱼船。  
他时如觅云踪迹，不是梅边即水边。

**游记诗** 在《元诗选》中所收高氏诗歌大部分篇幅是其遍游名山大川时的抒怀之作，其中《过信州》（一作《题阳台道中》）一直为后人称颂，认为大有“唐人意度”：

### 《过信州》

二千里地佳山水，无数海棠官道旁。  
风送落红捲马过，春风更比路人忙。

类似的佳句还如：乐府体诗句“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绝句“无限飞红随马足，春光更比路人忙”。

在游记类作品中，高氏还有两首颇具特色的诗作。一首《岳阳楼》，另一首是《至正己亥四月廿二日宿翠峰禅室登留云阁数日与净莲公》。据笔者看，前者意近李白，后者直拟李贺：

### 《岳阳楼》

九天汇荆楚，一楼名古今。  
地连横岳胜，山压洞庭深。  
宿雁落前浦，晓猿啼远林。  
倚栏搔白首，空抱致君心。

### 《至正己亥四月廿二日宿翠峰禅室登留云阁数日与净莲公》

米老天机清，梦入烟云窟。  
山河大地影，玻璃镜中出。  
任自选胜场，莫浪翻墨汁。  
今于西湖滨，割取南半壁。

## 三

在笔者所存清末陈衍所辑撰的《元诗纪事》中，也收录了高克恭诗作十一首（含一“题句”）。在书前作者简介中，言高氏“有《房山集》”，亦可见高克恭之《房山集》对后世的影响。

《元诗纪事》中所收高氏十首诗作中，有二首诗和一“题句”为《元诗选》所未收：

《寄友》

并行沿堤步晚晴，野香牵引过林□。  
谁知却是江南梦，寻到西曹夜直厅。

《即事之二》

鸡鸣上马戴星还，邻近人家见面难。  
一度相思一回首，二千里外得相看。

《题句》

雪山随处觉，风雨兴中孤。

在其余与《元诗选》所收相同的八首诗作中，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出入，这里不再多叙。总观《元诗选》、《元诗纪事》所收高克恭这位元代名画家的诗作，虽然所反映的题材不免有些单一，但都是直抒胸臆之作，既反映出作者刀孤傲诞直而又聪颖睿智的性格，同时在字里行间寄托了一种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心情，应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今年是一代名画家高克恭去世 690 周年，限于手头资料，未能找到全部《房山集》，特检出其部分诗作拟成本文，略加介绍，以为纪念。

参考书目：

- |              |                |
|--------------|----------------|
| 1、《元诗纪事》     | 清末陈衍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
| 2、《元诗选》      | 清人顾嗣立编、中华书局    |
| 3、《北京古今名人辞典》 | 马尚瑞主编、新华出版社    |
| 4、《中国人名大词典》  | 臧励和编、商务印书馆     |
| 5、《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 谭正璧编、光明书局      |
| 6、《文艺辞典》     | 孙俚工编、民智书局      |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作者系区政协文教工作办公室干部

## 《水曹清暇录》中的房山风物

栗景鸿

房山历史悠久，民风淳厚，风土人情有着极强的地方特色。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在《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志书中多有记载，为后人研究房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

题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一直被有识之士所重视。但在古人的见闻随笔类作品中也不乏对一个地区风物掌故方面的记叙，例如在清人汪启淑著的《水曹清暇录》一书中，就有不少关于房山地区名胜古迹、社会风貌的记载。

汪启淑，又名庚，字秀峰，号切庵，清代歙县（今属安徽省）人，生于1728年，卒于1799年。因在浙江经营盐业，为当时富商，寓居钱塘（今杭州）。乾隆时援例捐资入仕，官至工部都水司郎中。汪启淑一生工诗好古，经常与当时名人雅士如翁方纲、厉鹗等往来唱和。著有《涿掌录》、《小粉场杂识》和《水曹清暇录》。

另外，汪启淑还是当时江南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所藏图书古印极富，家有“飞鸿堂”、“开万楼”专藏其书。《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著、上海书店版）收有汪氏藏书印“开万楼”、“启淑私印”、“汪启淑印信富贵长寿”、“飞鸿堂藏”等六款印样。《藏书纪事诗》（清末叶昌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有“汪启淑”条，其赞诗言：“社散南屏寺里钟，年华终贾骋词锋。书船何似玉川子，雪压短篷过五茸”，对汪氏的藏书生活作了中肯的概括。该书介绍汪氏“嗜古有奇癖，藏书百厨”，并记述了有关汪启淑藏书的一件轶事，可见汪启淑藏书之精：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朝廷诏访遗书，汪启淑应诏时呈“精醇秘本”五百余种（一说六百余种），大受重视。翌年发还原书时，乾隆皇帝为其所进《健康宝录》和《钱塘遗事》亲笔题诗，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褒奖。顺便提一句，《古今图书集成》是清康熙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类书，也是中国现有的最大最完整的一部类书。全书10000卷，计1.6亿字。本书编成后，于雍正六年（1728）由清内府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只印了65部，故异常珍贵。

《水曹清暇录》（以下简称《清暇录》）是汪启淑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时，于公务之余写的见闻随笔。是书内容广泛，主要涉及了清代北京地区的政事掌故、趣闻异事、社会风情、名山胜水等方面的史料，共计756条。根据笔者逐条翻查，其中有10余条专门涉及到良乡、房山、琉璃河、上方山、百花山等地内容，是十分珍贵的文字资料。

### 有关风景名胜的记述

房山风景名胜众多，自古以来，曾有不少名人雅士驻足流连，或留下吟咏诗篇，或留下资料性随笔，以为后人传诵。《清暇录》中就记载了当时百花山、琉璃河大石桥和上方山等处的景致，不但使我们领略到了二百多年前房山地区的自然风光，同时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宛平县西约二百里百花山，颇多花卉，有不见经莫之能名者。然产毒蛇，长只七八寸，人一被，竟不救（《清暇录》第648条）。

此条中让人感兴趣的是山上所产的毒蛇，蛇身不长，却能夺人性命。在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这种毒蛇不知还能否存活下来。再看下一条：

琉璃河在良乡县南四十里，上有大石桥。嘉靖年间，各处捐银三十余万两，永陵又助银九万三千两始得成。有明张居正碑记（《清暇录》第398条）。

作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琉璃河石桥始建于明永乐十六年，明嘉靖十八年进行重修，嘉靖二十五年完工，做工古朴，工程浩繁，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查《北京市房山区志》，仅节录了明嘉靖工部尚书雷礼撰写的《新建琉璃河石桥碑》，对《清暇录》中谈到的张居正碑记未曾涉及，而张居正碑记是否遗存到现在，不得而知。但从这段资料中，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显赫一时的明廷内阁首席大臣张居正能屈身为一座石桥题写碑记，琉璃河石桥的重要性便可见一斑。

《清暇录》中有“上方山”条，对现在我区有着“森林公园”之称的上方山景区记述颇详：“房山县有上方山，由孤山口经石梯而登。石梯即就山石略加斧凿，仅容半趾。山势甚陡，两边故垂铁链，使人攀援。竹垞朱检讨有诗云：‘山心夜不寐，冻雀喧前窗。香厨卯饭熟，杰阁晨钟撞。梃车束枋马，各雇舆丁双。弯环柳

木椽椅，夹以枣木杠。舍村入坡陀，百折循崆口。万古此积石，山农绝耕口。短松走长根，老树撑空腔。径尽缘仄磴，险过梯云杠。置身缥缈间，若掉都庐幢。曾轩坐僧榻，喘定心犹口。’山顶稍平，兜率院居其中央。竹垞诗云：‘幽燕古奥室，兜率居中岩。花宫七十二，下上东西嵌。六时响鱼鼓，四面围筠杉。沙泉细流续，石壁遗经劓。欲探乳穴胜，改着短后衫。其中路窈窕，其外云封缄。百千羊须珠，往往垂龙衔。所嗟脚力弱，畏此高崑崙。山僧饭我腹，朴野言多僂。嗣岁期重过，同把黄独饒。’左边山下一斗泉，颇清冽。竹垞诗云：‘昔寻一斗泉，俯睨千花塔。壮岁不知疲，三日行两口。重来筋力倦，十五换僧猎。已拚百骸困，犹幸半踵纳。崖倾旋曲蜗，石扁镂文蛤。雨旸迭晦明，龙虎互垂合。忽焉松门在，茅屋向斜搭。短绠汲澄泓，微风吹飒沓。精庐忘归，惜未携酒榼。向下招游朋，仰视笑不答’。山有十三洞，游甚艰难。然旧传洞中石肖龙、虎、钟、鼓、罗汉、灵芝、莲花，不一而足。洵乎奇境也”（《清暇录》第157条）。

文中通过引用清代著名词人、学者朱彝尊(号竹垞，字锡鬯，浙江秀水人)描写上方山的三首诗作，侧重记述了该山“陡”、“险”之情状，读后令人有身临其境，不由人不发出“洵乎奇境”的感喟。

### 有关历史人物的记述

了解一些明朝初期历史的读者或许对姚广孝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姚广孝，江苏长州人。十六岁出家为僧，一生辅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备受重用。后被授太子少师，卒后追封荣国公，葬于房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到了晚年，却丝毫没有功成名就的感觉，恰恰相反，倒有了一些淡淡的悲凉感。这在《清暇录》记载的一首姚广孝“自赞诗”中是显而易见的：

仰山寺有明姚少师广孝画像，其自题赞云‘这个秃斯，忒无仁闻。名垂千古，不值半文’。惜自悟之晚也(《清暇录》第165条)。

### 有关趣闻逸事的记述

这方面的内容在《清暇录》中共有3条，先看第1条：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日卯时，有凤凰集于房山石梯儿沟山峰上。高约五六尺，尾长丈许，五色具备，文彩绚烂。伫立逾时，向东北翱翔而去。见《畿辅通志》(《清暇录》第26条)。

《北京市房山区志》“大事记”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有凤凰集于房山县之山沟。总理石道事务散秩大臣常明等向雍正帝奏称：据石工监督司官田周呈报：房山石梯沟中，见瑞凤集于千峰顶，五色具备，文彩灿然，工匠樵牧居民千余人，莫不共见。

文中的“石梯儿沟”和“石梯沟”即今天的燕山办事处辖境凤凰亭附近。看来，“凤凰集于房山”应确有其事，虽然两文所记的时间稍有出入(一说为二十日，一说为二十九日)。于是第二年，雍正皇帝便赐旨，在凤凰出现的石梯沟附近修建了“有凤来仪亭”——凤凰亭。至于凤凰究竟在哪天“惠顾”了房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作进一步考察。再看第2条：

良乡县南城下……有声，祝祝如鸡呼雏。邑志所载，为八景之一，城角鸡鸣也(《清暇录》第138条)。

查《房山县志》记载的“房山八景”、“房山旧八景”中均无“城角鸡鸣”的内容，想必汪启淑笔下所提到的“八景”当为“良乡八景”，而“城角鸡鸣”，也许就是那时良乡的“八景”之一。

良乡县既有神马一匹，骨相权奇，啮蹄跋扈，人多莫敢近；去来无定踪，相传为厥神坐骑，号曰神马。良乡令陆耀署中西宾张国学有《神马篇》，其诗云：良乡县马三百匹，苜蓿春肥百不一。可怜骨瘦如堵墙，

那得蹄高夸踏铁。连朝络绎来官差，食料才半出马牌。岂无一二大宛种，长途力尽死即埋。厩中一马雄顾盼，似向天育图中见。额高九寸毛尽拳，镜夹双瞳焰如电。县中健儿控不得，云是厩神之脚力。无端驰突迹无穷，倏尔归来汗流赤。或闻此语变颜色，事涉虚无勿为惑。君不见，周王八骏天下行，又不见，夏后双龙天降精。任尔腾骧号神骏，呈才天厩名始成。彼独胡为但放纵，抑或不遇王良控。倘鉴驽骀能死忠，盍贬情性乘时用。呜呼，盍贬情性乘时用！（《清暇录》第 571 条）。

看完第 3 条内容，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良乡地区真的出现过“神马”，但至少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的一种美好意愿。而且文中提到的“陆耀”，也倒是确有其人，据《北京市房山区志》载：陆耀，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一年曾任良乡县令。

### 有关土特产品的记述

在《清暇录》中，记载了房山三种“特色产品”，一是“一目鱼”，二是“石窝稻”，三是名石“青芝岫”：

房山县甘池，在石将军庙前，池中产一目鱼，长仅数寸，每于清明节始出石穴游泳。县之西乡产石窝稻，色白而粒粗，其味亦极香美，炊以为饭，虽时值隆暑，历数日亦不餽（《清暇录》第 43 条）。

房山有玲珑巨石，高约三丈，广几七尺，色青润而洞透。米万钟曾竭力欲运安勺园，行次良乡，石重竟不可致。乾隆年间，取入万寿山乐寿堂，赐名青芝岫（《清暇录》第 553 条）。

上面两段文字虽然不多，却把三种特产的主要特征一一示给读者，引人产生暇思。

颐和园成寿山乐寿堂前的房山奇石“青芝岫”（栗景鸿 提供）

这三种特产除了“一目鱼”我们未能亲见外，目前石窝地区仍生产着品质优良的稻米，而且民间也确实还流传着“石窝米好，蒸煮七遍不烂”的说法；谈到奇石“青芝岫”，刊载在《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上的杨亦武先生《青芝岫》一文曾介绍了一首乾隆皇帝特为“青芝岫”题写的御制诗：“天地无弃物，而况山骨良，居然屏我乐寿堂。青芝之岫含云苍，崔嵬刻削衰直方，应在因提疏乞以前劈元黄。无斧凿痕剖吴刚，雨留飞瀑月留光”。邓拓的《燕山夜话》一书中也有专文记述。被乾隆皇帝赐名“青芝岫”的这块奇石，现在仍完好地保存在颐和园乐寿堂中，供人赏玩。

### 有关建制沿革的记述

最后，再谈一段涉及到良乡县的建制沿革方面的记载：

良乡县，去顺天府西南七十里，汉时名广阳，唐改固节，亦称盐沟，又名涧沟。东南数省入都之咽喉也（《清暇录》第19条）。

此条除对良乡县的建制沿革作简要记述外，以“东南数省入都之咽喉”之语言中良乡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见汪氏的见识。

总看《水曹清暇录》一书，从多个方面记载了二百多年前房山地区的风情事物，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房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衍变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是有志于研究房山地区历史的人士手中一册不可或缺的案头之书。

参考书目：

- |             |                |
|-------------|----------------|
| 1、《水曹清暇录》   | 清人汪启淑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
| 2、《藏书纪事诗》   | 清人叶昌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
| 3、《中国藏书家印鉴》 | 林申清著、上海书店      |
| 4、《中国人名大词典》 | 臧励和编、商务印书馆     |
| 5、《中国大百科全书》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 6、《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 7、《房山区地名志》  | 北京出版社          |
| 8、《北京市房山区志》 | 北京出版社          |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高柵日记》与房良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栗景鸿

始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今已整整过去了一个世纪。其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至今仍流传于全国各地，影响遍及乡村城镇，被后人所传扬。

房、良地区因地处京畿要地，自然也是当时义和团运动重要的活动区域。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及《房山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房、良两地的主要村庄均设有拳厂，民众参加甚广。他们烧符降神，习练武术，以抗御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赵润东、戴家斌两位先生在《房山文史资料》第1、3两辑中分别有专文《房山义和团拾零》和《房山义和团纪略》作了记述。这里再介绍一册记载与房、良地区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私人日记，作为补充材料，借以丰富一下房、良地区的历史。

这册日记名为《高柵日记》。作者高柵(1852—1904)，字城南，四川泸县人。曾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使，后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使。历任刑兵工三科给事中。著有《借禅室诗钞》、《高给谏奏稿》等。义和团运动兴起时，高柵正在北京，目睹外军暴行和百姓疾苦，所感所发，汇于笔端，“排日详记成帙”。

《日记》共分八卷，起自庚子年(1900)五月十五日，止于辛丑年(1911)正月十六日，近十万字。高柵去世后，(日记)经其九弟高楷崖八人四日整理抄写完毕，于光绪卅年(1905)排印问世。

《高栢日记》的主要部分记叙了团民活动及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其中亦间杂有关房山、良乡等地区义和团团民活动的见闻。下面就主要条目略记一二：

(庚子年五月)十九日，于晦若来，示我何润甫涿州来信，十五日发。言去时在良乡，已解散拳民。谓在涑时，杨统领名福同，所带兵皆洋装，误为洋兵，遂与角。杨又开炮，故伤之。涿州拳民四五千，已将解散。后又来山东老团六七千人，似颇有难解之势。何言受国厚恩，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语多骑墙，而偏于难解一面。盖亦以为危也。且谓天不雨，恐成流寇。……晦若言，今日九城皆闭片刻。适顺治门闭，虚一缝，许红抹额者入，不许平人入；或恐拳民激怒洋兵，不免有玉石不分之虑。或曰，洋兵来者不过一二千，且广东未见此举，何至施及京城。

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怂拳。拳谓已见上谕，不敢练。刚曰“上谕不要紧”。未完，送邸钞。上谕以拳匪在内城焚烧杀人，日夜数惊，命九门提督会同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一体严拿。遇有持械喊杀者，即送提督正法……(卷一)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样一些资料：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活动在良乡地区已有相当规模，并与“涿州拳民”、“山东老团”等义和团组织互为呼应，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极度恐慌。出于对洋人的畏惧以及清政府屈膝卖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对这场爱国的农民运动进行劝解、解散和镇压。

《日记》中提到的曾来到良乡“怂拳”的刚毅，在当时的清政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刚毅(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任军机大臣。因其人竭力反对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委派管理健锐营，为发动政变出力。义和团进逼北京时，刚毅力主招抚。并支持慈禧驱使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慈禧曾命他与庄亲王载勋“统率”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刚毅随慈禧太后西逃，中途病死于山西侯马镇。

作为慈禧太后宠臣，在义和团运动愈来愈盛并开始成为清政府隐患之时，刚毅曾受命与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翹、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前往涿州、良乡一带察看，企图冒险采取笼络、欺骗手段，通过控制两地的义和团来控制北京的义和团，达到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这就是上面日记中提到的“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之事。刚毅始到良乡之时，未知清政府已下谕百姓禁止练拳，仍然对拳民以“怂拳”安抚为主。据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所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载，刚毅自涿州奏报良乡、涿州义和团情形时，强调两地加入义和团的百姓甚多，“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剴切晓谕，使之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可见当时良、涿两地义和团的发展规模。

至于《日记》中所提的清军统领杨福同，也是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赵润东先生在《房山义和团拾零》中已有所涉及：

“(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在直隶涑水县石亭镇用长矛将清军分统领杨福同扎伤堕马，旋即毙命”，这就是义和团历史上有名的“涑水大捷”。而在这场战斗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山地区的义和团团民。

据《要录》载，当时清政府因“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谕令裕禄严格约束兵丁，不得“任意株连，借端论索”。但是清兵的劫掠之行，仍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于是，涑水石亭村的义和团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等地拳民数千人，先围攻驻村小队清军，待杨福同闻讯率马、步队前来援救时，设伏将杨刺死。刺死杨福同的是涑水义和团首领，一位名叫满立的僧人，后被清军抓获(具体情形在《要录》中有较详细记述)。这是自义和团运动开展以来杀毙清将领之较大事件，引起了清政府极大的震动。

再看《日记》下面几则：

(庚子年八月)十九日，……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盖十七晨所出队，由良乡搜剿而回者也。路人云，轰村不少。因十三四土人谣传，拳匪将来恢复，且云团聚在外甚多，故洋兵出而剿之。又活捉拳匪六名，车载而归。(卷二)

(庚子午八月)廿一日,九愚言,德兵向伊子言,良乡之轰,其炮子能穿大树,拳匪当之,纷纷倒地。”(卷二)

(庚子年九月)三十日,黄小霁言洋兵至房山,欲毁城市,马教士力言乡中居民靠此买盐米,一毁则乡民绝食,洋兵乃允。(卷三)

上述三则通过高栢本人的亲见亲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八国联军入侵我房、良两地,大肆抓捕义和团战士,并到处进行烧杀抢掠的罪行录,读来令人发指。

(庚子年六月)二十日,……张主事来,言房山山中亦吃小米,隔三十里一场,买小菜往返六十里。围山多团,挽出香货至百余金。又言良乡令张君聘终日哭泣,兵差过境,照常价加倍,村民怜其拮据痛哭而与之也,团又阻之曰,此车本团所需。官为劾办,团欲加刃。(卷一)

上面一则前半部所说为当时房良两地百姓、义和团团民各自的生活状况;后面述说了官府与义和团为各自所需而发生的相互摩擦,这则日记较真实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日记》中所提张君聘实有其人,查《北京市房山区志》可知,张君聘,名琨,江西人,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任良乡知县。

(庚子年八月)十一日,房山知县赵某将拳匪收监,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卷二)

据《区志》知,文中“赵某”为赵元璋,山阴人,光绪二十五年六月至二十八年八月任房山知县。此条所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短短八个字,就活画出一个凶残镇压义和团运动、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与上面“欲与洋人决裂”的义和团战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来让人义愤填膺。

再看几则:

(庚子年五月)廿二日,黄绍廷来,言必决战。房山北山无米菜,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闻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卷一)

(庚子年八月)廿四日,拳匪在良乡、黄村一带,洋兵往则散,洋兵走则归,聚而劫村庄,拒官长。张君聘已赴省请兵……(卷二)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两则直接记述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虽寥寥数语,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房山人民誓死抵抗外侮的斗争画面。“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应是外敌在房山烧杀抢掠的结果,必然激起房山人民的英勇反抗。“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同时采取了“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游击战术,既说明了我抗敌的决心,又说明了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性。

总的看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与其它各地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只是以迷信方式进行自发的抵抗外敌的活动,势必导致这场运动最终的失败。但是,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房山人民及全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高栢作为一位封建时期的官员,所站的立场必然要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诬蔑义和团运动为“拳匪”、“拳乱”,歪曲了历史事实,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百年前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以特从其中摘抄部分有关房良地区的资料加以简要介绍,并希望引起读者对《高栢日记》这一类私人日记、笔记资料的重视。

#### 参考书目:

- |               |              |
|---------------|--------------|
| 1、《庚子记事》      | 中华书局         |
| 2、《义和团》       | 中华书局         |
| 3、《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 李文海、林敦奎、木克光著 |
| 4、《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 北京出版社        |
| 5、《北京市房山区志》   | 北京出版社        |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溥儒与《上方山志》

张寿江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绘画界有“南张北溥”一说。“南张”是指四川的画家张大千，“北溥”是指北平的画家溥儒，这两位画家在我国大江南北名重一时。溥儒，字心畲，号羲皇上人，别署西山逸士，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他是清道光宣宗皇帝的曾孙，恭忠亲王奕訢之孙，贝勒载滢的次子。1963年11月18日病逝于台湾。

溥儒少年时就读于清室为贵胄开办的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法政大学），结业后赴青岛入礼贤书院学习德文，先后两次赴德留学，并获得柏林大学的天文学和生物学博士学位。然而，使溥儒饮誉海内外的并非这些，而是他在国学和绘画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溥儒三十岁才开始学习绘画，当初纯属出于兴趣，画无师承，全凭自悟。皇宫、王府内的藏画，使他在恣意赏玩之余，又引起弄笔临摹的兴致。而少年时期在诗文、书法方面的造诣，更为他在绘画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他1926年举办第一次画展，1934年任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据台静农撰写《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一文讲：“溥心畲先生的画首次在北平展出时，极为轰动，凡爱好此道者，皆为之欢喜赞叹。”特别指出的是：“他的润笔在北平琉璃厂肆固然是居第一位……”由此可见，溥儒在当时北平画坛上的重要位置。然而溥儒并不以画家自称，他晚年在台湾曾对弟子说：“如若你要称我画家，不如称我书家，如若称我书家，不如称我诗人，如若称我诗人，更不如称我学者了”。此话并非妄言，看看下面笔者通过搜集他的著作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溥儒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者。因为这些著作恐怕不是哪一位画家、书家和诗人都能完成的：

《四书经义集证》，《群经通义》，《尔雅群言经征》，《经训类编》，《六书辨证》，《灵光集》（编清朝遗老诗），《慈训纂证》，《汉碑集解》，《经籍释言》，《上方山志》，《白带山志》，《戒台寺志》，《华林云叶》，《凝碧余音》（诗集），《寒玉堂千文》，《寒玉堂诗文集》，《寒玉堂论画》，《西山集》，《寒玉堂诗词联集》，《琅缳记馀》，《云林一家集》（集唐诗），《陶文存》，《金石考略》等。

以上这些著作，与我们房山有密切联系的是《上方山志》和《白带山志》，《白带山志》曾由中国书店再版，故不介绍。下面我们专门来介绍这一部《上方山志》。

扉页是由罗振玉题写的书名。右上侧写有楷体小字，“庚午孟春”，庚午即1930年，中间写有篆书“上方山志”，左侧写有落款：“上虞罗振玉署”，下钤一方白文“罗振玉印”。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言，号雪堂，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秀才出身。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从事教育工作，创办东文学社。1900年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1901年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曾一度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搜购大量出土的甲骨。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往日本，1919年春回国。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所召，入直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器物。“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参预制造伪满洲国的活动。1933年任伪满洲国检察院院长。1940年病逝。著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附简考释》等。

第二页印一方框，里面写有篆书：“岁次强圉单阙月阳极大荒落文楷斋刊”。左下侧印有一行楷体字：“板存上方山兜率寺”。从那时算起，已经过了七十余年的风雨，现不知此板是否还存于兜率寺，想必早已荡然无存。

接着是释自如写的“原序”，这位释自如，在序中讲他：“俗武姓，顺天大兴人，父名国栋，母萧氏，康熙丙戌(1706年)十月望日卯时余之生辰也，六岁即来上方文殊殿依族叔上瑞下公师为徒……”由此得知，自如是清康乾时期的人，在乾隆年间曾出版过一部《上方山志》，此文是重新刊载的。

后面是“辽阳杨钟羲撰”并书写的“上方山志序”。他写道：“幽燕五为帝都，土载奥区山苞神藪，西山为太行别阜，其北有军都山，西南有大防山，为金明帝王弓剑之所上方山之最胜者也，山之深泉石草木之幽……”、“……揽胜之编辽金以往竹素无传曹能始有游记，而一斗泉水洞之美，始彰朱锡庵姜西溟吊霍处士，而大小黄六聘山之迹始著，恭忠亲王常以致政之年，远寻方处之契瞻依鸞岭乐而忘疲，王孙西山逸士博物善作目，清池妙禅善周之请，即自然旧志而稽图牒……”

杨钟羲(1865-1940年)字子勤，号留讬，又号雪桥，祖籍辽阳，世居北京，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十五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入湖北巡抚端方幕，曾任淮安知府，江宁知府。辛亥革命以后，寄居上海，适吴兴刘承干刻《嘉业堂丛书》，杨任校勘。1923年由沪回京，任古学院研究员，设雪桥讲舍，中外来学者先后百余人，曾一度赴日本访书，多见善本名刻。擅长书法，求者甚众。1940年秋，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再往后是溥儒于“己巳十月”(1929年)用行书写的序。他最后写道：“……乾隆间僧自如堂有志矣，然简焉不详，清池上人居是山有自如之志，属余列序其事而为之记，乃考稽典，述山川之胜，概附自如之末敬房之名，遇霍原而已彰焉用志。”

溥儒画像 (张寿江 提供)

再翻过来是“清上方山兜率沙门清池莲舟撰”写的“上方山志序”，文中写道，“……房山县为京西名胜之邑，而天下山川府州郡邑各有其志，虽有各志，而郡邑第事非专属，略而不详，由是名山大川，又各有其志，以补郡邑所未备也，上方山者虽载府县志，仅存其名也，自汉华严神僧生于印土，开建燕属上方驱龙造庵，兴衰不知几度矣，迄至皇清一千八百余春秋，蒙世祖章皇帝与世宗宪皇帝，先后钦赐匾额多方，继续诸亲王赐匾额对联等，历有稽考至乾隆年间自如师草创山志，惜多未备，迄今民国百余年代始造山图，今按图而稽了如指掌是作也，不可谓无补于郡邑之所未逮云。”

接着是“上方山志凡例”。全书共分十卷，卷一山水田附，卷二儒释，卷三考工，卷四碑碣，卷五物产，卷六艺文一记，卷七艺文二记，卷八艺文三诗，卷九艺文四诗，卷十艺文五诗，书画附，补遗诗。

书中还印有四张画像，第一张是画家叶昀(仰曦)绘画的溥儒青年时期的小像，他身穿长衫，左手持一书，端坐在一块山石上。右上角有溥儒题写的文字：“咸阳布衣人间何此无宝诀，珊瑚之饰有涧壑风云之气，庚午七月，心奋自题。”后面是溥儒为“清池上人，妙禅上人，善周上人”白描上半身画像。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卷前都印有“西山溥儒述，上方兜率沙门妙禅清池善周刊”的字样。

上方山是大房山的一条支脉，在房山区西南部的岳各庄，有九洞十二峰的名胜和以兜率寺为中心的十二茅庵等古迹。志书对此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还一共绘有25幅山势地名图和14幅上方山故事图。除此之外，书

中还辑录了恭亲王奕訢及溥儒、溥傅兄弟二人咏上方山各景的诗句。现抄录其中溥儒作的一首《摘星陀》诗：

千仞寒云外，孤峰落照边。长空没鸟飞，绝壁断苍烟。

临下疑无地，争高只有天。上房星斗近，日暮会群仙。

溥儒从1917年以后，隐居于京西马鞍山戒台寺十余年。这期间，他在这里读书学习，游遍了京西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都注意收集和研究这些地方的资料，经过调查整理，撰写出《上方山志》、《白带山志》和《戒台寺志》，为我们今天研究京西名胜古迹和北京地方文献及志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 参考书目：

- |                |                     |
|----------------|---------------------|
| 1、《溥心畬画谱》      | 荣宝斋出版               |
| 2、《台静农散文选》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 3、《燕都》         | 1989年第一期，北京燕山出版社    |
| 4、《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 5、《收藏家》        | 1998年第二期，收藏家杂志社出版   |
| 6、《北京文史》       | 1998年第二期，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出版 |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